

清晨,天空刚刚泛白,一层薄雾,宛若仙女的纱巾,轻轻飘荡在长江和嘉陵江交汇的朝天门码头。两江四岸,停泊的各种轮船还闪烁着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岸上如林大厦倒映在江水里,与之交相辉映。

“上车了!”小李拉我登上了去黔江小南海的大巴车。车从朝天门汽车站驶出,穿行在“火柴盒”似的高楼之间,突然一个急转弯,驶上宽阔的黄花园大桥。只见远处3座横跨在嘉陵江上的大桥格外吸引眼球。小李说,最近的那座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嘉陵江大桥,紧挨着的是新建不久的渝澳大桥,再往上是去年才通车的嘉华大桥,上游还有石门大桥、高家花园大桥……上世纪50年代,重庆没有一座过江大桥。现在,有各种大型桥梁许多座,千姿百态、风采各异。

小李是一位从事交通规划的干部。一路上,他乐此不疲地向我说起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近11年来巴渝大地交通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在巴渝修路难,修高速公路更是难上加难呀!在重庆境内,群山起伏,江河纵横,东北边有巍巍耸立的大巴山脉阻隔,东南边有莽莽苍苍的武陵山脉横卧,还有长江、嘉陵江、乌江天险,94%的区域是山地和水域。加上

年初,无意中看到周海婴拍摄的照片,很是惊讶。没有想到他在摄影方面还有如此的天赋。这都是70余年间的底片,两万余张,从未发表过。后经陈丹青等友人挑选,在北京国子监搞了个图片展,一时观者如云。周海婴一直低调。其父在遗嘱里说,不要去做空头的文学家和美术家,他一直记着。一生从事的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从不介入文坛的事情。他上世纪30年代末开始接触摄影,那不过是余时的神游,没有做艺术家的野心。喜欢科技的他,对镜头语言别有心得。有些照片,品位很高。要不是亲朋的建议,那些老照片大概会更久地睡在书房里吧。

不善言语,却喜欢借镜头表达,默默地与世界对话,在他是一种精神活动的方式。他不像自己的父亲总在文字和美术间穿梭。好像对感性的场景更感兴趣,涉猎广泛,对身边的一切均有好奇之心。文人脾气、平民苦乐、都市节奏、小镇风俗,楚楚动人地展示在其镜匾之中。比如上世纪40年代上海街头难民的特写,战乱的捕捉,都让人喜欢。那些关于小人物的镜头,是真切而感人的,从拍摄的角度看,有深深的感情在,不像小布尔乔亚的作品那样自恋、悲悯的成分很多。那个时代的疾苦都从其间流出,真是一部沉重的乐章。我由此感到一点鲁迅的遗绪,在对小人物的表现上,鲁迅的风味也是有的。只是到了他那里少了鲁迅的惨烈,多了温情的东西而已。

上世纪40年代的民风颇可玩味,然而留下的图片有限。要不是海婴先生用镜头语言记录那些片断,我们可能对彼时的风貌遗漏些什么。一部分

享受散步

苏连硕

许多人平常主要的健身方式是散步。散步即无拘无束、随便自如地走路。心态应该是挺平和挺冲淡挺闲适的。现在流行养生健身,而“健康就在脚下”,“走出健康”,便是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散步的升华。只不过有人走得过于严肃过于僵劲过于快速过于急功近利,因而散步的本意也就大有改变,起码不大讲究散步的心态了。

散步为的松动、舒展形体四肢,也是为的放松、宽舒情绪。唯散步才最自由率真,不失个性、不失自我。

俗话说“老要张狂少要稳”,如果不是故意穿凿抬杠,这“张狂”的积极意义是要回归自然、回归童心的。岁月只能憔悴我们的容颜,不能苍老我们的心,而且离童年愈远,离童心愈近。出门散步就像出笼的鸟,林中的鸟儿中的鱼,放学的孩子,但求无遮无拦、无拘无束。

地质结构复杂,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可想而知。改革开放前,重庆乃至当年的四川省内,没有一条高等级公路。1990年,市第一条高速路——成渝高速公路开工,通车里程也只有114公里。1997年,重庆市就提出了“振兴重庆,以交通为切入点”的战略措施。一场“半小时主城、8小时重庆”的交通大提速拉开了序幕。“半小时主城”,就是在主城九区范围内,从区委区政府出发到重庆人民广场或市政府都不超过半小时。“8小时重庆”,是指任何一个区县行政所在地到主城8小时以内到达。这个目标2003年底就现实了。现在又提出到2012年,实现“4小时重庆”的新目标。

大约一个半小时,车进入乌江峡谷。此时,早上的太阳已露出了微微笑脸,把整个乌江两岸染成了金色。车在悬崖峭壁中穿梭,头上是金灿灿的奇峰异石,脚下是碧波荡漾的乌江水,美丽的乌江画廊尽收眼底。坐在前排的一位老年人,吟咏起清代诗人

读书人的形影,朴实而有趣,还略见古风。而青年人与街市孩童的神态,没有被什么污染过,就那么清纯地閃动着。1948年,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准备新中国成立后的政协工作。众人从海上行至大连,又去沈阳,郭沫若、沈钧儒、侯外庐、李富春的形影,被他一一记录(见右图)。那艘船上没有记者,海婴记录了诸多迷人的片段。现代史研究者看到这些颇为惊奇,视为珍品是无疑的。那些民主人士的许多文字我都读过,对他们的日常化的片影知之甚少。周海婴似乎对那些人的宏大文章没有兴趣,他注意的是知识群落的一角,有的人在他的镜头里竟活了起来。

那时他还是不到20岁的青年,身边却常常聚集着沉重感的人。这形成了很大的反差。用天真的眼光看世界,自然与父辈们拉开了距离。许多年来,他接触了大量作家、学者,偶然也出席他们的会议。他不太喜欢参加那些讨论,仿佛是局外客,学会看人,近看、旁看、远看。并在一个角落默默寻找什么。在他的影集里我看到了许多熟悉的老人们:茅盾、巴金、萧军、季羡林、曹清华、李何林……这些照片都很传神,有的简直是艺术摄影,光圈、角度、色调,都挺讲究。几代人对鲁迅的叙述不同,那些老人都想些什么,他未必能从理论的角度视之。可是他们的神采却被定格在历史的深处。有一张照片《胡风家属》,苍凉的画面里流出的是热流,梅志的神态辐射着太多的隐念。他或许从老人的目光里看到父辈的形影,鲁迅之后的文化之影就在此延伸着。这一切都和他自己的生命有关。他知道,不仅自己被鲁迅的影子所笼罩,他身边的许多人也置身于鲁迅的寓言里。

周海婴有自己的事业,但因为是鲁迅之子,人们对其精神活动便知之甚少。他一直试图走出自己的路,不希望被父辈的光环照射。这些老照片,似乎已证明了这些。但在我眼里,如此众多的作品,记载着鲁迅的身后史。新文化传统的变迁,也融进了他的光 and 热。而对读者来说,他在沿着父亲的身影,继续着无数个故事。每一代人面临的话题均有不同,但相近的体验是有的。这同与不同,便构成了一种谱系,我们读起来,别有一番意味的。

好的习惯使人勤。散步即使使人勤。懒散贵在散,没了散意,光剩下懒了,那就得另当别论。

散步,曲径通幽最好。人声鼎沸,嚣声盈耳,浮躁乱心。幽静处才适宜扭,适宜跳,适宜玩,适宜耍,适宜“猴”,适宜“疯”。人多的地方就要收敛,就要古板,就要伪装。

散步离不开“步”。光玩不行,还得“步”。太慢不行,一味的快也不行。既不要刻意快走,因为还要玩,还要赏。天空有大雁飞过,脚下花团锦簇、蜂蝶翩跹,也浑然不顾快步如飞、勇往前进么?俯仰皆情趣,万不可不屑一顾也。

“行之所当行,止之所当止”,不要非得规定走多远,完不成指标绝不罢休。不要给人感觉,好像赶火车,好像翻山越岭抢占高地。不徐不疾,不快不慢,慢中有快,疾中有徐,漫不经心,洒脱冲淡。

养生重在养心,散步贵乎散心也。

巴渝路上

刘代荣

梅若翁形容乌江的那句诗:“蜀中山水奇,应推此第一”。我也不禁脱口而出:“有缘行在此山中,我们都是画中人。”老人转过头来与我们打了一下招呼,又兴致勃勃地朗诵起:“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车上的乘客不约而同为他送上了热烈的掌声。他接着对我说,我们这里有句俗话,“养儿不用教,西秀黔彭走一趟。”说的是酉阳、秀山、黔江、彭水这些山区贫穷落后和条件艰苦,实质上反映的是信息闭塞、交通不便。这也让人凋朱颜哟。我对老人说,这是过去的说法了,如今早变了。老人很是赞同,连说变了,大变了,你看看现在的乌江一带,就可以感知一二了。

一位坐在我们左边的中年女士,穿着入时,在黔江做了15年服装生意。她说自己曾经苦楚的事有“三怕”:一怕坐车。过去,由于公路路面狭窄、坑坑洼洼、弯急坡多,车颠簸厉害,每次都被颠得头晕呕吐,常常是上一次重庆身体要几天才恢复过来。



《深圳大道》研讨会在京举行

11月12日,中国作协和中国版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张友高长篇小说新作《深圳大道》研讨会。陈建功、李准等近40名专家学者到会发言,大家就作品的主题思想、叙事方式和文体突破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讨。认为作品在宏阔的时代背景下,以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绵密传奇的人物关系,展示了深圳特区从风生水起到波澜壮阔的腾飞过程。

(罗宇)

看到吴欢最近发表在《人物》杂志上的文章《半百之年回望导师》,顿生很多感慨,不由想起一些往事。

大约是1950年夏秋的一天,我下班去吉祥戏院听京剧。到了那里才知道那天演出的不是京剧,而是新凤霞演唱的评剧《锁麟囊》,我最不爱听评剧,失望之余转身想回去。这时身边一位客人对我说:“您听听吧,这个演员很不错的。”我犹豫了一下,想想晚上无事可做,既然来之则安之,就听听吧。戏开演了,一阵定场锣鼓之后,幕内传出女主人公薛湘菱的一段道白,吩咐丫环如何为她置办嫁妆,声音清脆妩媚又带着点矫情。当幕帘掀开,剧中人一亮相,这一刹那,我立刻被她吸引住了,扮相漂亮、文雅,身段优美潇洒,再听她的唱腔,已把我对评剧的成见一扫而光。她的嗓音绝对与众不同,唱腔轻柔婉转,没有评剧中常会带有的浓重鼻音,响亮而不刺耳,柔媚却不低俗,总之这个叫做新凤霞的演员,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和无限的回味。

大约是在1953年吧,吴祖光来我家,因为祖光是剧作家,谈话之间就谈到了戏剧,我提到一个叫新凤霞的演员演出的《锁麟囊》非常不错,当时祖光的表情十分讶异,也正是这一刻,我们才知道原来祖光兄的夫人,即新凤霞也。此后,凡有凤霞嫂的演出,必送票给我们:如《春香传》、《小二黑结婚》、《刘巧团圆》,包括他改编的京剧《三打陶三春》等;但是我看过许多新凤霞的演出,却从没见过她本人。

1958年,祖光和我的老伴曹辛之都被打成了“右派”。那是临近春节约十来天,单位人事部门通知“右派”们将被送往北大荒军垦农场接受劳动改造,要他们到北京南河沿中苏友协门前集合,家属只能在那里送行;在这个特殊场合,我第一次见到了也来为祖光送行的凤霞嫂,大家相见在这种场合下,说不出是高兴还是难过;在此一别之后,是漫长的改造与等待。1960年,部分“右派”从北大荒撤回北京。我不知道祖光何时摘掉帽子,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右

一位县环保局长写了封匿名信,状告自己“工作不力,欺上瞒下,不查处严重污染环境问题”,“还说经济发展了,污染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信中列举了该县一系列生态环境被破坏的问题,让人触目惊心,痛感“局长”之可气可恶。这位堂堂的“局座”为什么把一盆脏水往自己头上泼?是头脑发昏了,还是故意恶作剧?都不是。局长的头脑清醒得很,对自己的行为清楚得很,他明白,在工作无法推动,又难以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处境下,不得已而用“苦肉计”,实属无奈之举。

原来,他那个县的主要领导要政绩,要发展,口号是“一快夺千金,发展实行跨越式”,“一心搞经济,跨越要看GDP”,“一切工作都要为GDP让路”。环境保护投入大、见效慢,有的还影响当年的GDP增长,“顺理成章”地被列入“让路”的工作。环保资金被减了又减,财政拨付拖了又拖。搞环境建设被说成“背离中心”、“突出自己”、“对抗领导”。查处污染事件被扣上“不顾大局”、“想出风头”、“给大好形势抹黑”的帽子。在这样的条件下,环保工作的艰难,环保局长处境的尴尬,可想而知。宏观一点讲,这种情况绝不是一两个县的问题,虽然有轻重程度的不同,但在前些年是相当普遍的。

近两年大力落实科学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施环境保护的严格政策,节能减排指标的一票否决制,形势大有改观。但这并不能说,环保系统干部“挺得住”就“站得住”了,更不能说其它系统、部门也不存在这问题了。事实上,类似环保局长的处境,在各行各业都是时有发生,并不鲜见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领导体制虽然正在进行法制化改革,但在不少地方仍然民主缺失,制约不足,那些敢于坚持原则的干部,提不同意见的干部,勇于揭露问题的干部,遭受排挤打压,被调离原岗位,被“冷藏”,被“边缘化”,甚至被抓“小辫子”而处分等等,绝不是个别现象。

科学发展观要落到实处,首先应提倡讲真话,办实事。要让“挺得住”的干部“站得住”。这除加快民主制度建设,创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制度环境外,还应在以下三个方面给以特别关注:一是干部的选拔,特别是主要领导的任命,除能力和水平外,必须把思想意识和民主作风摆在重要位置。再好的制度,还得人去执行,没有民主作风,听不得不同意见,那些一心为公,敢于坚持原则的干部,怎么能站得住脚!二是领导部门的权力配置和领导的工作分工必须界限清楚,尽量减少重复交叉,否则“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下面那些事业心较强,敢于坚持原则的干部。因为这些同志常常是认理不认人,顾事业不顾关系,很少考虑保护自己。三是领导机关对所属干部之间的重大是非争议应有个明确的肯定或否定态度,不能把所有不同意见都看成是权力之争,各打五十大板或抹抹稀泥了事。总之一要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鼓励、表彰那些重事业轻关系的人,让他们的腰杆挺得直,双脚站得稳,别再出现环保局长自己告自己的怪现象。

上个世纪末,文友赠我一块小小的佩玉,自此,我与玉器便有了不解之缘。

对一件物品,我从来没有像今天对待玉器这般痴爱。其实,原因很简单。玉器,是有来由的,她是物质的,更是人文的。

从玉文化融入国家的典章制度,到玉成为收藏品,我们不能淡忘了孔子。就是这位圣人赋予玉以人格化、道德化的含义。孔子说,玉有十一德。是不可以这样说,玉蕴含了中国入独特的精神气质——不尚五色炫目,而崇尚平易可近;不尚外露,而崇内敛。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身份不同,佩玉的意味也就不一样,或示受命于天,或表地位尊贵,或显品行高尚,或求吉祥如意。尤是孔子寓精神内涵于玉,终令玉器和玉文化传承千年而不衰。

玉器,之所以显得珍贵,是因为她的不可再生,不可复制。作为亿万年才形成的矿物质,当是开采一块而少一块的。

玉器沉默不语,她从工具、兵器而图腾、仪仗而缀冠、饰身,从历史深处走来,色泽不减,追逐者愈众。收藏玉器犹如将一个奥秘无穷的大千世界托于掌上,在品鉴中体味历史文化的悠远,进而认识、保护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

玉器,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成为有钱就能买到的东西,以至而“飞入寻常百姓家”,那是宋代的事了。如果说,宋代城市繁荣、经济相对发达、文化艺术高度发展,是一种客观条件的话,那么嗜玉成癖、爱玉如命的宋徽宗赵佶的主观“努力”——设宗正寺玉牒所和修内司玉作所,并编百卷《古玉图谱》,终令宋代淡化了玉器宗法礼制功能和奉神事鬼的神秘色彩,走向了世俗化、装饰化。

玉石可分为“硬玉”和“软玉”两大类。狭义的软玉单指我们的和田玉,广义的软玉则包括蓝田玉、南阳玉、绿松石、青金石、玛瑙、琥珀、水晶等诸多玉石。

我曾托人觅购一块带枣红皮的和田玉。这块玉,怕是有些年代了,不必言其雕琢风格,单看其“包浆”程度即可。众所周知,玉器制成后,玉暴露于空气中,或埋于地下,或经人体接触,或其他原因,会产生颜色变化。“水料经次生氧

水落之后,玉面生出一层淡素色的膜来。”台湾大学的一位地质学家说,他们在河床中采集玉璞时,观察到一个现象,淹没在水中的部分,常保持玉子的原色,而赭色的薄膜多生成于露于水面玉上的部分。忆起陈性《玉纪》载:“凡三代以上旧玉,初出土时质地松软不可骤盘,只可在手中抚摩或藏于贴身常得人气养之……养之年久,地涨自然透出,层厚一层,渐渐复硬,再挂再养,包浆亦自然徐徐铺满,还原十足,酷似宝石,此之谓文工,非十余年不能成也。”我所得之玉,怕非古玉,“包浆”只是证明了其“脱胎”有了些许年份。

小小物件,自有探究不尽、玩味无穷的意蕴。而今,收藏者众,也该是水到渠成之事。而作为一种流通于市场的商品,玉器对于繁荣经济,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目前,中国的玉资源越来越稀缺。如不将其有效保护,将来,我们的后代也许在若干年后再也不能见到原汁原味的玉石了。

在泥土里发酵

贾文华

把这块无比精致的玉搁在泥土里发酵搁上一辈子不去玷污她的外表她是一股相思的良药

也许今生今世都不会欣赏到那份绝代妖娆或者只是昙花一现地感受一回玉洁的照耀

会不会有朝一日出土在我不再有爱的梦之城堡将心静如一尊玉雕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感召

东大桥居住,我曾去过两次,一次是在1992年,我的儿子第一次举办画展,请吴祖光为画展写一篇前言。画展开幕那天,祖光兄早早就到场,然后是曹辛之在抗大时的老师、诗翁艾青,这次相见并合影,也是他们最后一次的相会。1995年曹辛之去世,两三年之后艾青去世,大约在1997年我又去东大桥祖光家约他为我编的《曹辛之纪念文集》撰稿,这两次去他家,都没有见到凤霞嫂,直到她去世,我都没有再见过她,这一生我们只有两面之缘……

这些年来,多少老友乘鹤西去。在这一代文人的交往中,总使人感到一种真诚和浓厚的友谊,他们并不经常见面,一年来往一两次,甚至一两年见面一次,但并没有因此使友谊淡漠,似乎彼此间有一种心灵上的默契,在他们身上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君子之交”,那么淡淡的,却又浓浓的友情……所以,这些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往事,却在心中挥之不去。

放”,当时他家住在马家庙一个四合院,院内种了不少花草树木,幽雅宁静。因为昙花开放时间很短,而且多在半夜开放,所谓“昙花一现”,难得一见,因此我们刻期前往,赶到马家庙,看到约两米高的昙花已经半开,这天我记得大约开了七八朵,雪白的花朵有碗口大,散发着淡淡的幽香;难得一见的昙花,十分高贵典雅,这是我生平唯一一次看到昙花。

十年“文革”终于结束了,而凤霞嫂却病倒了。从我们到她家去欣赏昙花到她去世,我没有再见过她,他们后来搬到